

莎士比亚

戏剧八种

· 集注本 ·

上册

[英] 威廉·莎士比亚 著

孙大雨 译

上海三联书店

莎士比亚

戏剧八种

· 集注本 ·

上册

[英] 威廉·莎士比亚 著

孙大雨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孙大雨和莎士比亚戏剧翻译(代前言)

黄昌勇

—

年初,很久未通音讯的孙近仁先生与我联系,说上海三联书店准备出版孙大雨译《莎士比亚戏剧八种》(集注本),建议我写篇前言,我当然婉拒,孙大雨的新诗创作成就、新诗理论探索、莎士比亚翻译等文学和学术贡献都是巨大的,虽然对几个领域我有些研究,但由我来写,显然力有不逮。不想,孙近仁先生来到学校,还是力邀我来承担这个工作,商讨下来,我认为如果客观地向读者介绍孙大雨其人和他的莎士比亚翻译等,还可试笔。

与孙大雨相遇,还要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那时我还在复旦大学跟随著名鲁迅研究专家陈鸣树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在选定博士论文题目时,与先生商量,想集中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陈先生那时正做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也没有要求自己的博士生一定要以鲁迅为研究范围,所以最后定下来以现代史上“新月派”作为我的申请博士的论文选题。

在阅读大量历史文献和研究资料基础上,我发现,孙大雨这样一位新月派重要人物却长久地逸出了人们的视线。后来在提交答辩的博士论文中,我将新月派分为前后两期,以期还历史真实面目。我将孙大雨被定位为后期新月派代表人物。这一观点得到了答辩专家的认同和好评。也因此,由新月派诗人的孙大雨,我又有对孙大雨进行全面研究的冲动。

1994年春天,我第一次拜访孙大雨,记得从复旦大学南区穿越市中心来到吴兴路一座高层住宅,据说这里是许多上海高级知识分子的住地,孙大雨平反后有关部门给他安置在这里,一套普通的三居室。其时,孙大雨已经是九十高龄的老人,穿着蓝布中式服装,大而宽的面庞已显松弛,显出若有所思的样子,他的思维已经处于混沌状态,前尘往事在他深邃记忆中只能永久埋藏,只是他偶尔用纯正的美式英语谈及莎士比亚、新诗格律等话题,提醒着我:岁月虽已流徙,却没有带走他心灵深处的刻痕。

面对这样一位老人,我知道我面对的是一段让人怀念、让人心惊肉跳的历史,我悄然离开,带着深深的遗憾。据说在我之前,除华东师范大学陈子善教授来访过,少有研究者问津。

博士论文完成后,我开始发表一系列关于孙大雨的文章,产生一些反响。孙近仁先生是一位医科专家,作为孙大雨的女婿,对我的研究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后来,孙近仁先生和一些学界朋友鼓励我撰写一部孙大雨传记,我也曾有过计划,但世事变迁,这一计划竟搁浅到现在,或许十多年之后来写这篇前言,有可能重新点燃我当年的兴味。

二

1922年秋,就读于上海青年会中学的孙大雨考取了清华留美预备学校高等科,他加入了“清华文学社”,当时闻一多、梁实秋等对这位已经在诗坛崭露头角的新社员很是看好,在文学社中孙大雨(号子潜)、朱湘(号子沅)、饶孟侃(号子离)、杨世恩(号子惠)并称“四子”,他们同住在西单梯子胡同,写诗作文,豪情满怀。

清华文学社诗友们的诗歌活动正值“五四”新诗第一个潮头由盛转衰时期,因此,他们承担着对“五四”自由诗反思的重任。他们更多地汲取英国浪漫主义和维多利亚时代唯美主义的诗思和灵感,在反思自由诗的同时萌发建立语体文格律诗的构想。

关于格律诗理论,那时当以饶孟侃的《新诗的音节》^①和闻一多的《诗的格律》^②两文的主张为代表,前者讨论了诗的格式、音尺、平仄、韵脚等属于听觉方面的理论,后者着重于诗的视觉艺术

的建构。孙大雨当时也在思考这些理论,但他是以自己的一首十四行诗作《爱》^③,自觉实践自己格律体新诗,用实际创作来传达关于新诗格律的构成,就是他后来提出的“音组”说。无论音尺还是音组都来源于英诗,其构成也是一致的,但是孙大雨认为韵文(诗)可以不押韵,与闻一多“建筑美”相区别,孙大雨认为音组是构建格律诗的基础,虽然要求每行音组数相等,但并不要求每行的字数相同。他对格律诗导致的“豆腐干”和“骨牌阵”提出了批评^④。

可惜的是,那时孙大雨对自己的“音组”理论只是艺术上的直觉,还未能在理论上做出令人信服的探索,只是在此后的创作或翻译中始终坚持这一形成韵文的前提条件——音组的创造。因而在二十年代中期开始的那场格律诗运动中孙大雨的独创并没有引起注意,客观上他的创作也没有在理论引导上产生更大影响。

1926年8月下旬,孙大雨赴美留学。在茫茫大海之上,他创作了格律严谨的诗篇《海上歌》,后经朱湘之手,发表在《新月》杂志第一卷第7号上。孙大雨进入美国东北部新罕布什尔州的达德穆学院(Dartmouth College)主修英美文学,并于1928年以高级荣誉称号毕业。之后,他又进入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研究院,继续攻读英美文学。在耶鲁,孙大雨沉迷在英美文学之中,特别是对英诗和莎士比亚情有独钟,他用自己节省下来的官费,购买了大量的英诗和莎士比亚原版剧作。

1928年10月2日,孙大雨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诗作《纽约城》,引起诗坛的注意,朱自清对这首15行短诗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是可以当作“现代史诗”的一个雏形来看^⑤,所谓现代性就是指这首诗的题材“现代化”、“工业化”特点,的确这首诗以客观、物化的场景展示了一幅现代化工业城市的草图。

1930年秋,孙大雨完成了学业,回国到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英美文学。

三

三十年代,由于新月派同仁聚散不一,《新月》月刊编辑人员不断更换,刊物以纯文学为主的宗旨不再保持,这引起不少同仁的不

满和非议。此时,徐志摩为重振诗坛,着手创办《诗刊》,并于1931年1月由新月书店出版创刊号。

徐志摩在《序语》中说,他将这份刊物看作是五年前北京晨报十一期《诗镌》的延续,“想斗胆在功利气息最浓厚的地处与时日,结起一个小小的诗坛,谦卑地邀请国内的志同者的参加,希冀早晚可以放露一点小小的光。”他更欣幸于“五年前的旧侣,重复在此聚首”。而这“五年前的旧侣”之中,就有刚回国的孙大雨。

《诗刊》第一期中既有朱湘、闻一多、徐志摩等“新月”老将,也有陈梦家、方令孺、邵洵美等新人的作品,孙大雨的三首十四行诗《诀绝》、《回答》、《老话》则显赫地置于篇首。

如若说1926年孙大雨的十四行诗试作没有引人注目的话,那么,此次一次性推出的三首诗作则令人注目了。对于西方十四行诗的移植,在中国新诗运动中,早有反对者的声讨。例如,在刊载孙大雨这三首十四行诗同期刊物中,梁实秋的《新诗的格调及其他》,明确指出:“我不主张模仿外国诗的格调,因为中文和外国文的构造太不同,用中文写Sonnet(即十四行诗——笔者注)永远写不像。”但在一片异议声中,与胡适、梁实秋交情深厚的徐志摩起而为孙大雨辩护。徐志摩认为:“大雨的三首商籁(即十四行诗——笔者注)是一个重要的贡献!这竟许从此奠定了一种新的诗体”。^⑥

在《诗刊》第二期的“前言”中,徐志摩认为:“大雨和商籁体的比较成功已然引起不少的响应的尝试”,梁实秋虽然反对用中文写十四行诗,但认为这种尝试,正是钩寻中国语言的柔韧性乃至探检语体文的浑成、致密,以及别一种单纯“字的音乐”(Word-music)的可能性的较为方便的一条路。

诗人梁宗岱也撰文予以支持:“就孙大雨的《诀绝》而论,把简约的中国文字造成绵延不绝的十四行诗,作者的手腕已有不可及之处。”^⑦值得一提的是《诗刊》第二、三期连载孙大雨的长诗《自己的写照》共318行,这是孙大雨计划中的一部千行长篇诗作,后来又在1938年第39期《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80行,^⑧终未能续作,成为残篇。^⑨

《自己的写照》在诗艺上用挥洒的每行四个音组来表达,由于

气质的蓬勃横溢,诗作多用飞扬沸腾的跨行或泛滥来表达。

这首诗一发表,即引起当时诗坛的震动,徐志摩倍加推崇:“这二百多行诗我个人认为十年来(这就是说自有新诗以来)最精心结构的诗作。第一他的概念先就阔大,用整个纽约城的风光形态来托出一个现代人的错综意识,这需要的不仅是情感的深厚与观照的严密,虽则我们不曾见到全部……,但单看这起势,作者的笔力的雄浑与气魄的莽苍已足使我们浅尝者惊讶。”^⑩陈梦家说它“托出一个现代人的错综意识。新的词藻,新的想象,与那雄浑的气魄,都给人惊讶的。”^⑪邵洵美后来说:“《自己的写照》在《诗刊》登载出来以后,一时便来了许多青年诗人的仿制。”^⑫

《自己的写照》或因为是残篇或因为新月派以及作者的命运,为新文学研究者和读者长期遗忘。

七十年代初,台湾诗人痖弦撰文认为这首残诗“为中国新诗后来的现代化倾向作了最早的预言”,誉之为“未完工的巨大纪念碑”。^⑬三十年代,徐志摩已占据诗坛高位,孙大雨游美数载,加之新诗数量有限,因而不能广为人知。徐志摩当时对他倍加推崇与激赏,一方面表明他对孙大雨诗作慧眼独识,也显出徐志摩的大家风范。只可惜徐志摩英年早逝,而红火一时的《诗刊》在出完第四期后无疾而终,而《诗刊》第四期也自然成为同仁悼念志摩的专辑了。孙大雨于1931年12月2日写完悼诗《招魂》(此诗排在《诗刊》同仁悼诗之首)告慰志摩在天之灵以后,也少有诗作问世了。

当年徐志摩将自己的诗集《猛虎集》赠送孙大雨时,在扉页上题辞,左书“大雨元帅正之”,后署“小先锋志摩”。人们很少提及徐孙之间的交游,而此则成为历史留下的唯一物证。

陈梦家当年认为孙大雨的十四行诗“给我们对于试写商籁体增加了成功的指望,因为他从运用外国格律上,得着操纵裕如的证明。他的一千行‘自己的写照’,是一首精心结构的惊人的长诗,是最近新诗中一件可以纪念的创造。”^⑭邵洵美对孙大雨的诗推崇备至,认为他“捉住了机械文明的复杂”,“把这一个时代的相貌与声音收在诗里,同时又有活泼的生命跟着宇宙一道滋长。”他说“孙大雨是从外国带了另一种新技巧来的人,他透澈、明显,所以效力大”,他认为只要一看孙大雨的近作,便可以确信:“新诗已不再是

由文言诗译成的白话诗,新诗已不再是分行写的散文”、“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韵节,每一个时代又总有一种新诗去表现这种新的韵节”,孙大雨“最大的成就”就是表现这种新的韵节。^⑮苏雪林当时也认为孙大雨是徐志摩、闻一多“一双柱石”之后的“新月”之中一员出色的诗人。^⑯

四

1932年初,孙大雨离开武汉大学,应聘北京师范大学和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1933年初应胡适邀请到北京大学外文系任教。同年下半年,孙大雨又应青岛大学外文系主任梁实秋之邀,从北平赴青岛任教。可是学期结束后,孙大雨竟没有收到学校的续聘书。原来,孙大雨因为与梁实秋在莎士比亚剧作翻译中观点分歧导致了这一结果。

早在1931年,孙大雨就翻译了莎士比亚的一些剧作,其中有《King Lear》(节译)、《罕秣莱德》(第三幕第四景),这些分别发表在徐志摩主编的《诗刊》第二、三期上。

徐志摩对孙大雨的“试译”当时就给以很高的评价,认为孙大雨的译笔矫健、了解透彻,“这是我们翻译西洋名著最郑重的一个尝试;有了他的贡献,我们对于翻译莎士比亚的巨大事业,应得辨认出一个新的起点。”^⑰

为什么徐志摩认为孙大雨的试译是一个新的起点?因为孙大雨对莎剧有着不同与时人的认识,莎剧百分之九十是用素体韵文(blank verse)即不押韵而有轻重音格律的五音步诗写就,所以莎剧是戏剧诗(dramatic poetry)或诗剧(poetic drama),是浑然一体的文艺作品。而当时的莎译,或者由于缺乏对莎剧戏剧诗性质的认识,用白话散文进行翻译,或者认为莎剧中的素体韵文用中文无法翻译也译为散文。梁实秋正持后一种观点。孙大雨不认同上述两种观点,他用自己在格律体新诗中探索出的“音组”理论,对应莎剧诗行中的音步,做出独异的莎剧翻译实践。

孙大雨来到青岛时,梁实秋已开始莎士比亚翻译工作。原来,胡适倡议组织一个“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翻译会”,在中国系统地介

绍出版莎士比亚的作品,由“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资助。基金会约请梁实秋、闻一多、陈西滢、徐志摩、叶公超五人合作进行。后来,徐志摩飞机失事、闻一多埋首古籍研究、陈西滢游学欧美、叶公超步入官场,因此只有梁实秋一人始终不渝地致力于这项宏大的工程。

梁实秋认为莎剧是有严谨格律的每行五音步的素体韵文,用中文无法移植,所以他的译文将莎士比亚戏剧译成散文的话剧。孙大雨却不同意他的观点,就在课堂上随意批评了梁实秋,于是有了学期结束后不再发给聘书的结果。梁实秋长孙大雨三岁,那时他虽然以新月理论家而为人所知,但远还未赢来他“雅舍”时代的声誉,又加上年轻气盛,不能容纳孙大雨的直言也是能够理解的。

四十三年后的1976年,在8月10日的《联合报》副刊上,梁实秋在《略谈“新月”与新诗》一文说:“孙大雨还译过莎士比亚的《黎琊王》,用诗体译的,很见功”、半个多世纪后,孙大雨忆及此事时说,他对于梁实秋的解聘并未耿耿于怀,而对于此后各奔东西、又有隔海相望不能见,直至梁实秋先他作古感慨万千^⑬。认为梁实秋付出数十年辛劳,译毕了全集,也应受到广泛、深厚的钦佩。

1934年初,孙大雨应浙江大学聘请为文学院外文系教授。在这里,孙大雨遇到了一位名叫胡鼎新的青年学生,孙大雨后来回忆说:“我从未碰到过如此勤学好问的学生。在课堂上他会不断提问,对课文定要达到彻底弄懂为止,而我最赏识这样的同学,我也乐于答疑,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⑭这位名叫胡鼎新的同学就是后来的胡乔木。

1934年下半年,孙大雨来到北京,接受胡适主持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资助,开始翻译莎剧。

孙大雨首先选定进行《黎琊王》集注本的翻译,他之所以首选这部“气冲斗牛的大悲剧”,因为在他看来,《黎琊王》“若说炉火纯青它要让《暴风雨》,若求技术上的完美它不及《奥赛罗》,可是以伟大而言,我在这位诗人之至尊至圣的全集中,也得推这部动天地泣鬼神的杰作为第一。”^⑮

孙大雨三十年代初开始莎剧的试译,只不过那时对于五音步素体韵文尚没有多大的把握。现在机会到来了,从1934年9月

起,孙大雨“竭尽了十四个月的辛勤”,完成了“这一场心爱的苦功”。孙大雨运用自己探索出的“音组”来对应莎剧中的“音步”,通过韵文行的尾断、中断、泛滥等手法,将原作每行的五个英文“音步”对译为五个汉字“音组”,他“抱着郑重的态度,想从情致、意境、风格、型式四个方面都逼近原作”,力求在莎译中“疲熟的格调则极力避免,腐辞陈套决不任令阑入。在生硬与油滑之间刘除了丛莽,辟出一条平坦的大道”,“此中不知经历过几多次反复的颠蹶,惨痛的失败。”^①

1935年底,《黎琊王》译竣后,孙大雨又作了两次修改,同时,二十年代中期探索的“音组”理论,经过新诗创作和莎译的运用,孙大雨渐渐从理论上把握了它。他想写一篇导言详细对“音组”原理加以申论,不料一动笔不能停止,结果写出一部十余万字的专书《论音组》,因为此再加上抗日战争的爆发,《黎琊王》一搁就是五年,1940年才得以排版。

1941年10月26日,在上海的孙大雨为《黎琊王》做序:

“最近国际战争的烟燎愈烧愈广,眼看着此间即将不能居住,而自忖也正该往后方去参与一篇正在搬演中的大史诗,于是于百忙中草就了本书的附录和这篇小序,作为十年来一场梦寐和无数次甘辛的结束。这本早应出版的译剧如今离我而去了,好比儿女告别了父母的檐梁,去自谋生路一般:我一方面祝祷它前途无量,莫深负原作的神奇,一方面也盼望知道自己所难知的缺陷,如果它有缺陷的话,以便再版时加以弥补。”

10月29日,孙大雨离沪赴港,行前将尚未排印的序言和附录稿交清。12月2日,由港飞渝时,因飞机限制行李的重量,孙大雨只得将《论音组》书稿和已校好的清样留在香港友人家里,不想香港失陷时,《论音组》原稿和《黎琊王》清样被焚,而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全部清样也遭损失。万幸的是,《黎琊王》正文和注解在离沪前已打好的纸版,完好无损。

后来因为战事的关系、人事的蹉跎,《黎琊王》出版又延迟了六年。1948年11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孙大雨第一部莎译集注本《黎琊王》,分上下两册,印行1000部。由译毕到成书相隔十余年,其间主要经历八年抗战,所以孙大雨在扉页上题辞:

“谨向杀日寇斩汉奸和歼灭法西斯盗匪的战士们致敬!”

五

青岛大学时期,孙大雨结识了京派文学重镇、小说家沈从文,殊为可惜的是我们已无法知道两人交游的史实,仅从沈从文的一篇文章中可以看出两人之间理解的深厚,沈从文在这篇短文中似乎已指证了孙大雨在青岛被解聘的遭际,更是对他此后人生命运沉与浮的最早预言。

1934年,林讲堂主编的《人间世》开设“人物志”,就是以名人写名人,列入其中的大都是近代以来学界的翘楚,而立之年的孙大雨侧身其中,而且是沈从文执笔为他“画像”即《孙大雨》一文。

“十分粗率的外表,粗粗一看,恰恰只是一个人的坯子。大手大脚,还在硕长俊伟的躯干上,安置了一个大而宽平松散的脸盘”,沈从文接着这样写,“然而这个毛坯子的人形,却容纳了一个如何完整的人格,与一个如何纯美坚实的灵魂!多才,狂放,骄傲,天真。倘若面对这样一个人,让两者之间在一种坦白放肆的谈话里使心与心彼此对流,我们所发现的,将是一颗如何浸透了不可言说的美丽的心”。或许因为经过文学表达的润饰,或许有中国史传统扬善隐恶的影响,沈从文也许给予了他笔下的人物过多的赞美,但是如下的叙写则能看出沈从文作为一个作家的敏感,他的笔触直指人物内心和灵魂,把那人生悲喜的根子在这里都作了传神的展示。

在沈从文的眼中,孙大雨比许多人认识“美”,而许多人比他更明白“世故”,他说孙大雨是一个“有脾气有派头的人”。他继续写到:他身边那些温顺,中庸,办事稳重,应对伶俐,圆滑如球而抹油,在社会上处处占上风的人提及孙大雨就是“大雨吗?”话语里埋伏了点嘲谑,不同意的神气酿在嘴角的微笑里,沈从文解写道:“这不足为奇,因为这些人平素就是怕魔鬼,怕高山,怕风刮,怕打雷的人”,因而,孙大雨在他们面前简直是一种“恐怖”。

这样不厌其烦地去引证,只是深味于沈从文的精到,“大而宽平松散的脸盘”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孙大雨的印象,孙大雨为人直

率,绝不同虚伪和懦弱谋妥协,这使他时常陷入孤立的境地。沈从文说他常常在课堂上与大学生舌战,在大街上与人作战,少数理解他的朋友对他这种精力耗费的用途无一不感到忧虑,而这少数的朋友中就有徐志摩和梁宗岱。沈从文说,没有他们,孙大雨回国后的成就也许难以取得,甚至“也许早就绝望自杀了”,我们难以知道这后一句话又隐藏了多少难堪的人生事实!

孙大雨这种充满入世应战的精神其实也在一步步使他从诗人、学者、教授的生活圈淡出,导引他走向人生的另一方也许本不该由他领略的峰巅。

1941年底,孙大雨来到大后方的山城重庆,任教于中央政治学校外文系。次年,他又加入国民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孙大雨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从书生到政治。客观地说,此时的孙大雨对国民党政府还是投了信任的一票,然而大后方的四年现实,以孙大雨的性格与处世原则,使他对国民党政府失去了信任。他批评,他痛骂,表示对当局的憎恶,他拒绝陈立夫请他到教育部任职的邀请。

1945年底,孙大雨回到上海,应聘为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次年,闻一多被暗杀激起他的愤怒,经罗隆基的介绍,他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后又参加了“大教联”(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的简称),他走出了象牙塔,以实际行动把政治的砝码移到了中共的一方,他曾代理大教联主席,在白色恐怖下民盟转入地下斗争,孙大雨领导的大专院校包括中学盟员继续活动直到上海解放。

1949年,孙大雨欢呼胜利的到来,因为这里还有他的一份并不可忽视的功绩。他积极送独生女参军,一方面任教复旦,一方面成了社会活动家,各种委员、主任的头衔纷至沓来。

但政治的独木舟决不会是一片坦途。孙大雨在迎来他的人生峰巅时就已削就了下滑的万丈深渊。

1949年5月27日,正在参加一个聚会的孙大雨等接到“大教联”开会的通知,他赶到会场,原来是原“大教联”成员李正文随部队回来了。久别重逢,他们想的是了解解放区的情况,不想穿着军装的李正文匆促地宣布改选“大教联”干事会,这使孙大雨等感到莫名和吃惊。结果,“大教联”中的民盟成员在干事会中全部落选。

孙大雨后来说落选事件对他打击很大。此后孙大雨就开始了近十年持续不断地向中央和上海各部门上告的征途。

孙大雨同样没有摆脱传统士人的心态,他也走上了上书直言的老路,就是那写给中央的惶惶的八万言书,当年孙大雨在上书时,罗隆基极力劝阻他,陈毅也不止一次出面调解劝说。然而,孙大雨一经起步,就不再回头,他性格中的执拗、倔强在此显露无遗。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与他同一时代的胡风的三十万言书,聂绀弩后来有咏胡风的诗句:“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读来让人无限感慨。胡风是用三十万言换来三十年苦难,而孙大雨是用八万言书换来二十八年的磨难,同样让人感喟万端。翻开一部中国历史,历朝历代上书者不绝如缕,但沿袭而下的大多都是血腥的结局。

也许孙大雨对十五年前解放区那场影响深远的整风不甚了了,也许他对解放以来针对知识分子的历次运动没有警觉,对“高价征求批评”(《文汇报》社长徐铸成语)感奋不已。1957年6月1日,复旦党委邀请孙大雨参加整风座谈会,他说:“响应党的整风号召,我就是走在路上跌脚,摔死也要来的,”6月8日,他的长篇发言刊登在《解放日报》上,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上海乃至国内各大报纸的批判文章铺天盖地而来。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的一次讲话中点明批评孙大雨是“顽固不化”右派分子。此后孙大雨被内定为极右分子,他被撤销一切职务和资格,又被推上被告席,以诬陷罪判处六年徒刑。“文革”中,他又一次被投进监狱,且加上了一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孙大雨把自己的人生盛年压在了政治的天平上,在政治的滩头上历险,他惨痛地失败了。

六

从1961年第一次服刑“保外就医”回上海至“文革”前,数年间孙大雨无业在家,生活上除偶尔有市委统战部和民盟市委不定期补贴外,全靠妻子的退休金度日。

历经坎坷的孙大雨整日呆在斗室,忆及人生世相的一幕一幕,

他又想到自己三十年代翻译莎剧的夙愿。是的,他的第一部莎译历经战乱,从1935年译竣到1948年出版相隔十余年,而此后,为了革命斗争,孙大雨没能再重操莎译宏业,建国后历次运动的冲击,政治生活的波浪,他也无暇顾及早年的夙愿。而今,面对早年自己购得的无数莎剧版本,孙大雨又将自己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莎剧绚烂缤纷的五彩世界之中。青灯之下,黄卷之中,孙大雨在重建自己的精神家园,他越过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回溯自己青年时代的理想和梦幻,诗人复活了,只不过带着如许的沉重。再度进入莎士比亚的迷幻世界,只不过外界条件让人难以想象,还有屈原、李白、乔叟、弥尔顿,他在一座座文化峰山之间穿梭、游移、淘洗、沉醉,架起一座座文化之桥。他陆续用诗体译出莎剧集注本五部:《罕秣莱德》、《奥赛罗》、《麦克白斯》、《暴风雨》、《冬日故事》。

孙大雨当年曾庆幸自己走出了象牙塔,而今重进象牙塔,他心头一定会有别样的滋味。

“文革”爆发了,孙大雨的精神驰骋也不得不中断,他又开始了更为惨酷的人生际遇。

第二次出狱后,看看空空的四壁,孙大雨几乎绝望,几十年来收藏的书籍包括字画、文物等被洗劫一空,万幸的是,家人冒着风险藏起来的几册莎剧原作还在。从此,孙大雨白天接受劳动改造,每当夜幕降临,就拉上厚厚的窗帘,沉浸在莎剧的艺术世界中。就这样又译出《梦密欧与茱丽叶》和《威尼斯商人》两部简注本。

从1934年起,前后半个多世纪,断断续续,孙大雨共译出八部莎剧。由于孙大雨对莎剧的诗剧或戏剧诗性质的把握,孙大雨认为将莎剧译成散文话剧有背原作风貌,虽然距理想还有距离,但自信要比较接近于莎氏原文风貌^②。在众多的译剧中,除林同济和卞之琳受孙大雨的影响用音组构成的韵文翻译莎剧外,“其他的译本,所有梁译、朱译、顾(仲彝)译、曹(未风)译、曹(禺)译、方(平)译……都把莎剧译成散文(或实际上是散文,尽管形式上分行)的话剧……”^③尽管关于莎译理论上还分歧和争鸣,孙大雨更近于原作风貌的莎译,应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与评价。

1967年,台湾文星书局出版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四十巨册。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经过校订、补译,推出以朱生豪为

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梁实秋和朱生豪的全译分别成为海外和大陆较为人们熟知。1991年始至今，孙大雨的八部莎译以各种版本和形式出版。今天，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孙大雨译《莎士比亚戏剧八种》，其中六部集注，两部简注，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既容纳了几百年来世界莎学研究的成果，也包含的孙大雨自己的很多创见，许多争论的问题在这里孙大雨都给出了自己的阐释，值得莎士比亚翻译和研究界高度关注。

1984年夏，在胡耀邦等的亲自关注下，孙大雨错划的右派得以改正，此前他的“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也被摘去，当年的判决也被撤销。孙大雨要求工作：“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爬起来。”他用一句典型的孙大雨式语言表达了自己的心愿，然而复旦的大门对他却紧紧地关闭。从1945年来到复旦直至1958年因反右而被开除，十余年间孙大雨人生的峰与谷都与复旦血肉关联。撇开政治观点的分歧乃至个人之间的恩怨，复旦也该有海纳百川的襟怀，一部复旦校史，怎么也绕不开孙大雨在复旦的人生刻痕，而我们却在复旦出版的几种《教授录》中觅不到孙大雨的名字。

“文革”结束后，孙大雨已是古稀老人，他要抓住生命的尾巴，日夜耕耘不辍，还致力于英诗中译和中国古诗的英译。然而时间橐橐可闻的脚步已经步步近逼，到九十年代初，孙大雨已不能再伏案写作了。

1997年1月5日，我接到孙大雨逝世的讣闻。送别那天，我从四平路上的同济大学再次穿越市中心，赶到龙华。寒意袭人，天还刮着大风，有点凄凉的告别仪式让人更添寒意：来告别的百十人大都是他的亲友和学生。孙大雨躺在鲜花丛中，安详的面容一如我几年前唯一一次见他那样显得若有所思。

我想，不论人们识与不识，那座文化的峰峦已清晰地刻上了孙大雨的名字。

注 释

①《晨报副刊》，1926年4月22日。

②同上，1926年5月13日。

③同上，1926年4月10日。

④《我与诗》，《新民晚报》，1989年2月21日。

- ⑤《诗与建国》、《新诗杂话》，上海作家书屋，1947年。
- ⑥《诗刊·序语》。
- ⑦《论诗》，《诗刊》第2期。
- ⑧《大公报·文艺副刊》，第39期，1935年11月8日。
- ⑨《自己的写照》残篇是诗人1930年回国前在美国纽约市，科伦布（俄亥俄州）和回国后早期所写，仅是长诗的一个开端。诗作在《诗刊》连载时竟有九十多处排印之误，直到1990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周良沛编选的《中国新诗库·孙大雨卷》时作者才一一作了校订。
- ⑩《诗刊·前言》，1931年4月20日。
- ⑪《新月诗选·序》。
- ⑫《诗二十五首·序》，上海新时代出版公司，1936年4月。
- ⑬《未完工的纪念碑》，《创世纪》，第30期，1972年9月。
- ⑭《新月诗选·序》。
- ⑮《诗二十五首·序》。
- ⑯《论朱湘的诗》，《青年界》第五卷第2号，1934年2月。
- ⑰《叙言》，《诗刊》第3期，新月书店，1931年10月5日。
- ⑱《我与梁实秋》，《济南日报》，1992年12月5日。
- ⑲《我与梁实秋》。
- ⑳㉑《黎琊王·序言》。
- ㉒孙近仁、孙佳始，《说不尽的莎士比亚》，《群言》，1993年第4期。
- ㉓孙大雨，《莎士比亚的戏剧是话剧还是诗剧》，《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1987年。

2012年5月1日，初稿，江湾五角场

2012年8月28日，修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2012年11月11日，定稿，上海戏剧学院健吾楼

目 录

黎琊王	1
暴风雨	241
奥赛罗	333
麦克白斯	487
冬日故事	601
罕秣莱德	747
萝密欧与 琺丽晔	969
威尼斯商人	1087
后 记	孙近仁 1183